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领导权问题

李维武

[摘要]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问题。为此,必须处理好党的文化统治权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自觉地意识到文化领导权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而在文化领导权上,又必须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统一思想与百花齐放的关系。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领导权;葛兰西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2)02-0039-06

[作者简介] 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有一项工作最为关键,这就是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可以说,强调和凸显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是贯穿于《决定》的一根红线,也是深入理解《决定》、努力贯彻《决定》的一个根本点。我们在学习、理解和贯彻《决定》时,必须紧紧把握住这根红线,牢牢立足于这个根本点,深入思考和探讨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问题。

一、文化领导权问题

一个政党对于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如果从权力运用上看,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其政

治权力进行控制,这可称为“文化统治权”;另一个方面则是以其领导权进行引导,这可称为“文化领导权”。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共同构成了一个政党对于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而后者与前者相比,对于实现一个政党在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更为重要和根本。这就使得文化领导权问题,成为一个政党在致力于文化建设时必须加以重视的关键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受到了关注,后来在列宁那里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实践;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明确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葛兰西十分重视政党在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对于这种作用进行了分析:“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他所说的“统治”,就是一个阶级及其政党以其政治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控制;他所说的“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就是不同于政治权力控制的文化领导权。他

认为,对于一个政党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来说,不论是取得政权,还是维系政权,文化领导权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

从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概念的阐释中可以看出,文化统治权与文化领导权,尽管都是政党在文化建设中的权力运用,但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文化统治权,是一个政党以自己的组织力量,实现自己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管理;特别是执政党,不仅运用自己的组织力量,而且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政府权力、财政经费,强制性地控制文化建设。因此,文化统治权在其运用形态上,总是呈现为一种外显的、具有硬性的权力作用。文化领导权,则是一个政党主要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实现自己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管理;这种精神力量,包括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历史研究、文学创作、影视戏剧、报刊杂志、网络传媒、大众娱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不在于强制性地控制文化建设,而在于通过这些文化内容的创作,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吸引力、影响力、凝聚力,以争取人心、凝聚人心,获得人民群众对该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因此,文化领导权在其运用形态上,总是呈现为一种不那么外显的、带有软性的权力作用。

在文化建设中,组织力量、国家机器、政府权力、财政经费当然起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还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在于精神力量。其所以如此,就在于文化具有与政治、经济、军事不同的特点,主要是属于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即使是今天的影视戏剧、报刊杂志、网络传媒、大众娱乐,尽管都与高科技密切结合在一起,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因此,精神力量更能与文化建设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内在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向,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建设的进程,对文化建设起着真正的主导作用。在文化建设中,一个政党如果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的领导,单凭自己的政治权力来加以控制,是

难以实现自己的领导权的;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政府权力、财政经费,来维系自己对文化的领导权。一个政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该政党失去了人心,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支持。葛兰西对此有过深刻的说明:“如果统治阶级不能达成一致,也就是说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行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等等。”^[3]因此,文化领导权尽管是不那么外显的、带有软性的权力作用,但对一个政党、特别是对一个执政党来说,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可以说,一个政党的文化自觉,首先就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的自觉。

正是这样,改进和加强文化领导权,对正在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在《决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决定》第一部分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决定》第九部分又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意识形态和宣传文化工作新情况新特点,及时研究文化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这些论述的核心,都在于强调文化领导权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都在于强调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

那么,如何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呢?在这方面,《决定》已经作了许多论述。概括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三个关系尤其重要。这三个关系是: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统一思想与百花齐放的关系。只有明确而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这三个关系,才能真正解决好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问题。

二、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的关系

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点,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深入研究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权,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决定》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时,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放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作出了专门的阐述。在《决定》中,不仅明确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首先在于“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而且指出了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人心的关键,在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决定》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涵。

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对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

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况看,经济生活早已取代了政治生活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中心,而经济生活又很快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由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元所有制经济,资本和货币在生活的各方面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用,中国人的生活在得到逐步改善的同时,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官员腐败、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社会问题。这些生活中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并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从中国人的思想状况看,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经济结构的多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利益的分化,使得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统一价值体系和共同理想追求出现了困境;诸多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加剧了价值的分裂和理想的缺失;由思想解放和对外交流而带来的思想空间的开放,则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思潮此起彼伏、相互激荡、激烈竞争;而互联网在20世纪末的出现与普及,进一步为这种多元化的思想开展与观念竞争,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和广阔的空间。这些历史性的大变化,使得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成为一项相当紧迫而又相当困难的工作。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再恢复到30多年前那种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时代当然已无可能,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加以看待、与时俱进地进行探索。在这里,尤其需要思考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从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力的宣传、多方的灌输、适度的规范,可以说都必不可少,但最根本的还在于《决定》所说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而其中又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为重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党的实践、党的形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党的

实践、党的形象具体地体现出来的。人民群众往往不是从党的纲领和党的文件中,而是从党的实践、党的形象中来理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融入党的建设中,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使党风及社会风气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使人民群众通过党的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行为示范和榜样作用,真正感受到党是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才能赢得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引导权,不是仅仅在单纯的文化范围内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作综合性、全局性的统筹规划,并加以认真地、切实地贯彻实施。

三、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

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必须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资源;要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就必须重视这两种文化。《决定》第一部分的开头,即对中国共产党与这两种文化的联系作了明确说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同时,《决定》还对这两种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意义,作了具体的阐发。

倡导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倡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进方向和基本内容。《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此,离开了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离开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这样,《决定》反

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然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精华部分)与中国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这种困难性在于:中国先进文化、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不是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是鸦片战争后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吸取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联系,既有后者继承、发展前者的一面,也有后者批判、扬弃前者的一面,这种批判与扬弃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还表现得相当激烈;而今天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从这种复杂的历史联系出发,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后者对前者的批判、扬弃,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背离和否定,就是“反传统”,从而尖锐地提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如何对这两种文化的历史联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是我们在学习、理解和贯彻《决定》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果要合理地解释这两种文化的历史联系,必须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文化传统,看到文化传统尽管是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内容,但毕竟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超历史的存在,是可变动的东西而不是永恒的

东西,因此在文化传统的变迁中,既有继承与延续的一面,又有转换与更新的一面,即存在着文化传统的古今之变。中国文化自鸦片战争起,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汇中,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如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鸦片战争后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更新,存在着两种传统。而在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中,既扬弃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糟粕的、过时的东西,又保留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精华的、仍然有生命力的内容。中国先进文化,正是这种文化转型与传统更新的产物;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也就在这里。

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提出了一个以历史主义看待中国文化传统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他在这里所说的孔夫子,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所说的孙中山,则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际上包括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今之变,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的认可与继承。对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由来与形成,毛泽东在1949年作了更明确的梳理与揭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5]这就从中国文化的总体变迁和变化脉络上,指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转换与更新,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传

统古今之变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直接继承孙中山而来的。

因此,只有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文化传统,讲清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才能破除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偏见,解决中国先进文化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只有如此,《决定》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才能获得历史的统一;《决定》所提出的“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也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和切实的贯彻。

四、统一思想与百花齐放的关系

改进和加强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是统一思想与百花齐放的关系问题。

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既然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那么就必然有一个统一思想的问题。所谓统一思想,是指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形成全党全社会的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这一点在《决定》中有多处强调,如第一部分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迫切,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第三部分指出:“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如何实现统一思想呢?从权力运用上看,当然需要运用党和国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包括运用国家机器,对文化建设加强领导和管理。《决定》对此有多处论及,如第二部分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时指出:“加强文化法制建设,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第四部分在论述“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时指出:“依法惩处传播有害信息行为,

深入推进整治网络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第七部分在论述“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时指出:“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完善文化市场管理,坚决扫除毒害人们心灵的腐朽文化垃圾,切实营造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市场秩序”。

但要实现思想统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还是党以自己的精神力量对思想领域的领导,即通过各种文化创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支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文化创作与政治行为、经济生产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文化创作的活动及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创造性,不仅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而且在内容上具有探索性,这就是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在文化创作中,不仅马克思主义内部会有不同观点、不同学说、不同学派的争鸣,而且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潮之间亦存在着竞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只有通过这种内部的争鸣与外部的竞争,才能获得自己的理论活力,焕发自己的思想魅力,发挥自己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确立自己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而这些争鸣与竞争也需要有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才能展开。要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导地位,必须不怕这种争鸣和竞争,同时学会这种争鸣和竞争。

因此,党以自己的精神力量领导思想领域,实现思想统一,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统一思想与百家争鸣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是《决定》所强调的:“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

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

当然,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以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与法律为底线;超越了这个底线,那就如上所论,需要运用党和国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包括运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干预。因此,在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同时,也不能否定党的文化统治权,关键在于把握好这两种权力运用的限度。这也是在学习、理解和贯彻《决定》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总之,《决定》所强调和凸显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也相当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好党的文化统治权与文化领导权的关系,自觉地意识到文化领导权对于党的极端重要性;而在文化领导权上,又必须处理好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与人民认同、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统一思想与百花齐放的关系。这种种关系,也就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所面临的现实的矛盾。只有对这些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才能说成功地解决了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领导权问题。

注释:

[1][2][3][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8,38,230.

[4]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34.

[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469-1470.

责任编辑:李海峰